

顧炎武傳略

趙 儷 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K82

趙儷生著

顧炎武傳略

上海人民出版社

顧炎武傳略

趙儷生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 1160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1 15/16 插頁 1 字數 35,000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4,000



顧 炎 武 像

目 錄

少年時代	一
兩番抗清	九
初到山東	一六
旅行山陝	二六
學問成熟	三五
晚年定居	四四
結束語	五三
後記	五七

少年時代

顧炎武是我國十七世紀的一位愛國思想家和愛國活動家，同時，他又是在學術上給了後世以重大影響的一位學者。因此，來敘述並評論一下他平生的主要事蹟，是有其必要的。

江東顧氏，是舊中國著名的大家族之一。從公元三、四世紀，即三國東吳和以後東晉的時候起，顧氏就跟當時的政局發生關係。據說，顧炎武的祖先在十世紀即五代時候，曾一度遷徙到江北；到十二世紀即宋朝時候，又遷回到江南，先在崇明島上居住，到宋末元初時候，這才遷到崑山縣來，成爲崑山人。

崑山位在長江下游，鄰江近海，與附近的太倉、常熟等州縣，同是產絲米魚鹽的好地方。這裏距離蘇州和無錫也不遠。明中葉嘉靖、萬曆時候，這一帶各行的手工業已經十分發達，有些歷史材料告訴我們，當時一些紡織和漂染的工場，可以顯著地證明當時的社會，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了^①。但晚明政權是一個極其腐朽的封建的君主專制政權，它通過屢屢增加的賦稅和力役，使農民和手工業工人貧困不堪，無法生活下去；它爲了

少數人的奢靡享樂，也盡量企圖把各行手工業生產和主要的貿易抓在自己手裏，扼制住小手工場主和商人的自由經營；甚至，在土地爭奪和對農民血汗的榨取上，這個君主專制政權的上層——皇帝、閹宦和大官僚，跟它所代表的中下層——一般的地主，也長期存在着分贓不均的爭吵。這就使得當時的社會矛盾非常複雜，特別是江南地區，由於它在全國社會發展不平衡狀態之下，是一個比較先進的地區，因此，這種複雜的矛盾，就表現得越發突出。

這種社會矛盾的複雜性，也反映在社會思想意識方面。當時，有一批被稱做東林黨人的士大夫知識分子，通過在書院中講學的方式，展開一個反對當權的宦官閹黨的鬥爭。這場鬥爭，到公元一六二三——一六二四年（天啓三——四年），發展到了劇烈階段。從根本性質上看，這自然是地主階級內部矛盾的一種反映；但由於具體社會矛盾的複雜，這種地主階級反對派的言論就不能不曲折地也反映了手工業工場主和商人的要求，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農民和手工業工人的某些要求：一句話，在這個地主階級的內部矛盾中，正在一天比一天更明顯地表現着一種市民的傾向。這種傾向要求輕稅薄賦，要求手工業和貿易的自由經營，要求地方勢力的自治。

顧炎武恰好出生在一種社會氛圍之中。他生在公元一六一三年即明萬曆四十一年仲夏。他的家族是一個官僚地主的家族。他的高、曾、祖三代先人，都曾中過進士，都曾

在朝廷中擔任過三、四品的高級官吏。家中自然也有相當多的土地。不過，到顧炎武的祖父和父親一代，這一家族的科舉功名日益不如以前，田產逐漸變賣。伴隨着這一情況，他們這個家族對於專制主義的依附性也有開始減退的迹象，他的祖顧紹芾和他的生父顧同應，已經是帶有濃厚隱逸氣息的詞章之士了。從顧炎武後來所寫的一些回憶性文章看來，他的祖對他的影響是相當大的。顧紹芾，號蠡源，僅是一名監生，性情有些孤僻。因為受到明末緊張政局的影響，他於流連詞章之餘，也非常關心政治。據說，他七十多歲還天天閱讀「邸報」（當時政府刊行的一種官報），並親手用蠅頭細字把重要內容抄錄下來，整理備用。從顧炎武十歲起，他就開始教顧炎武在讀書之外，還要抄書；他選擇了孫子、吳子等兵書，左傳、史記、國語、國策和通鑑等史書來教顧炎武讀，教顧炎武抄（作劄記）。他還時常告訴顧炎武，要特別留心天文、地理、兵農、水土等實用的學問；至於八股文（「制義」）則用不到太重視。像這些影響，都是好的。

這時，滿洲貴族已開始在東北邊疆上擴張勢力，表現出有滅亡中國的企圖。在顧炎武六歲上（公元一六一八年），滿洲兵侵佔了撫順和清河堡；七歲上（公元一六一九年），又侵佔了開原；九歲上（公元一六二一年），陷了遼陽和瀋陽；十歲上（公元一六二二年），又取了廣寧；真是節節進逼。伴隨着這一形勢的發展，在家庭中，顧炎武的嗣母王氏爲他選擇

了許多歷史上愛國者的故事，講給他聽。這對於顧炎武的思想，是有一定的啓發作用的。

大約十五歲的時候，顧炎武開始不僅僅接受家庭的教育和影響，並且直接去接觸社會。

這時正是天啓朝和崇禎朝更替的時候，宦官閹黨的惡勢力，受到了暫時性的抑制。士大夫們遭受的迫害輕了一些，於是他們繼東林之後，又組織了復社。顧炎武跟他同縣同歲的學友歸莊（字玄恭），一齊參加了。參加復社，自必參與講學論道，甚至評議國家政事——這在某些庸俗的地主子弟看來，已經是一種「異端」；加以歸莊喜愛寫作一些奇怪的詩詞，顧炎武的左眼由於幼年患痘生了雲膜，視力微顯偏斜和遲鈍，大家就嘲弄這兩個青年學友爲：「歸奇顧怪」。

顧炎武自從參加復社，更廣泛地接觸了一些士大夫分子以後，他對於當時科舉的弊病，是一天比一天認識得更清楚了。在他六十歲前後所寫的一篇生員論中，曾追述明末的情況說，天下生員不下五十萬人，其中通經、通史、通當世之務的人，簡直沒有幾個。他們主要是爲了避免衙役的敲詐和縣官的箠楚，爲了「慕功名」也爲了「保身家」，不惜關託人情，使自己列名「庠序」。既成生員，又巴結鄉官，勾通胥吏，形成宗派，作弊害人。看到這種情況，他決心走另外一條路。他對於科舉功名，極爲淡泊，雖然也考了幾次歲試，也應過鄉試，但始終無所成就。鄉里中顯貴的姻戚，如外祖母王家和妹丈徐家，他也從不拉攏，他跟

鄉里中的惡霸地主——葉家，簡直還積下了不解的怨仇。他所挑選的事情就是讀書，讀實用的書，讀五經，讀二十一史，讀大明一統志，讀各府州縣的志書；只這最後一項，據說他就搜集了一千餘種之多。他認為，只有從這些書裏，才能找到當時許多重要問題的具體答案。當時的重要問題，在他看來，不外以下這些：第一，農民爲什麼種不到地？地被什麼人佔去了？怎樣才能使農民又有地種？第二，國家收賦稅，是收糧和布好呢，還是收銀兩好？爲什麼明朝改收糧、布爲收銀兩？收銀兩有什麼弊病？第三，國家養兵是用屯墾耕戰的辦法好呢，還是發餉的辦法好？第四，開礦和海外貿易對國家有什麼好處？明朝爲什麼一再禁止？第五，中央集權，層層監視，對於地方行政有什麼阻礙？地方勢力的互相勾結，又怎樣才可以破除？怎樣才可以使中央行政和地方行政配合起來？第六，讀書人的風氣爲什麼那樣壞？怎樣才能使他們的朝氣振奮起來？——我們從顧炎武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從少年時候開始，經亡國之痛，直到老死，一生所最關心的問題，是這許多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問題。雖然他後來在對這些問題所提出來的解決辦法上，多少還帶有階級的局限；但我們是不可作過高要求的。在那樣的時代，一個少年人在他開始接觸社會時就注意這些社會上重要的具體問題，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

當時國家情勢，一天天地嚴重起來。滿洲兵節節進逼，西翼經常侵擾察哈爾、山西一

帶，東翼曾在公元一六三九年（崇禎十二年）和一六四二年（崇禎十五年）兩度侵入畿內，沿運河深入到山東的濟南和兗州一帶，到處燒殺淫掠。明朝政府連連敗兵折將，無恥地兩次派遣秘使跟滿兵議和，都不得要領而還。另一方面，明朝政府對於當時已自陝北發展到山西、再發展到河南的農民起義軍，却是又狡猾又兇狠，時而用「撫」，時而用「剿」，耍弄着不同的手段，進行鎮壓。但農民起義軍不僅未被削弱，相反，却不斷地成長和發展壯大起來。在顧炎武二十三歲上（公元一六三五年，崇禎八年），山陝各路起義軍十三家七十二營，大會於河南滎陽，檢閱自己的部隊。在他二十八歲上（公元一六四〇年，崇禎十三年），起義軍的主力部隊，在李自成和張獻忠分別領導下，提出「免賦」「均田」或者「減賦」等政治口號，對封建地主階級及其代表者專制主義王朝，進行更堅強的鬥爭。他們在洛陽殺了福王，在襄陽殺了襄王，在南陽殺了唐王，階級鬥爭發展到火般的熾烈。他們曾幾度進兵江淮，連顧炎武的故鄉一帶也受到了不小的震動，據說當時已經有些地主準備要向浙閩一帶去逃難了。

顧炎武自二十歲到三十歲的一段生活，就是在這樣緊張的局面下度過的。對於亡國的危機，他的反映是正常的，如同中國兩千年來強調「夷夏之防」的思想家所曾經表現過的一樣，他主張保家衛國、勵精圖治。對於農民起義軍，反映在文字上的不多，但從他的一生事

蹟看來，他在這一方面所表現的階級局限性相當強烈，他目他們爲「賊」，跟他們採取了迥然對立的立場，這個立場即便在亡國之後，改變也不太大。這個立場，從他的少年時代開始，就已經局限了他的事業，使他在參加復社、接觸到家庭以外更廣大的社會以後，不能充分地反映各個有進步作用的階層的要求。因此，他只好通過研究和寫作，來對當時的局勢企圖有所貢獻。自二十七歲開始，他動手搜集有關地理沿革的資料，準備撰寫他的第一部著作肇域志。他敘述寫作的動機說，「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①，可見他這最早的學術活動，也是跟愛國思想密切結合着的。而且，他在亡國前夜爲寫作肇域志所下的這番工夫，其意義還應被估計得更重大些。因爲，這番工夫不僅使他能够寫出了肇域志，並且也替他在不久以後寫的更大規模的著作——天下郡國利病書，以及晚年成熟的著作——日知錄，打下了結實的學問基礎。

現在，國難到來了。在顧炎武三十二歲這一年（公元一六四四年）的五月，滿族統治者看到中國的舊有政權被農民起義軍所打垮，而農民起義軍在北京剛剛成立的政府，又表現了種種政略和戰略上的錯誤與弱點。於是他們認爲有機可乘，便在漢奸、官僚地主分子吳三桂引導之下，從農民軍手裏奪取了北京，初步奠定了滿清王朝的政治基礎。消息很快傳到江南，亡國之痛，自如天崩地坼，是一場最大的震動。但清兵究竟還未即刻下到江南，當時引

起的只是一些社會秩序方面的小騷亂，如搶劫、縱火、報復之類。顧炎武在崑山的家宅被人搶劫了，黑夜裏又有人縱了火。這裏已無法居住，他遂伴同嗣母王氏遷到距崑山縣城八十餘里、位在崑山常熟兩縣交界處的一個偏僻地方——語濂涇住下了。在這裏，他跟鄉村父老夜坐水邊樹下，以沉重的心情談論着如何應付國難的種種問題。

從這一年起，他改掉了他的原名顧絳，另取了「炎武」二字。據說，這是由於他敬仰南宋愛國者文天祥的門生王炎午而採用了的。他原字寧人；另外由於他的故里是南朝梁陳時候大畫家顧野王所居的園林，一般人都稱呼那塊地方爲「顧亭林」，於是顧炎武又被通稱作亭林先生了。

① 見明神宗實錄萬曆二十九年七月條。

② 亭林遺書，亭林文集卷六，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兩番抗清

公元一六四五年（清順治二年）五月初九日，清兵渡過了長江，十一日，南都（南京）淪陷了。弘光帝朱由崧倉皇逃走，但很快就被清兵抓住。南明的官兵不敢抗敵，反而到處焚燒淫掠，加重社會秩序的紊亂。這時在太湖地區，包括蘇州到嘉興一帶地方，聚集着一支以勞動人民爲骨幹的抗敵武裝。長興人赤脚張三是太湖區漁民和農民的領袖，他與南明的副總兵魯之嶼、隱居在家的崇禎朝大臣楊廷樞、秀才陸世鎰等聯結起來，與兵抗清。當時「鄉兵四起，頭纏白布」，「民間柴斧，婦女裙幅，皆爲干戈旂幟」^①。一些愛國的士大夫分子，如復社領袖夏允彝、陳子龍等，也起來響應他們。陳子龍等在松江起兵；夏允彝還聯絡南明總兵吳志葵等，圖謀從海上向蘇州進軍。顧炎武有一首題名千里的詩，其前四句說，「千里吳封大，三州震澤通，戈矛連海外，文檄動江東」^②，正是描寫當時的情勢的。

顧炎武勇敢地參加了這次抗清起義。同他一道自崑山來的，有歸莊，有比他們小七歲的嘉定秀才吳其沆，還有崑山縣知縣楊永言。他們聚集在太湖與陳湖之間的吳江縣，這裏有一

支由「十將官」率領的千餘人的部隊，也準備參加起義。他們以劫牢爲號召，包圍了蘇州。六月十三日，魯之嶼帶領前鋒三百人攻入胥門，城內百姓羣起響應，並放火焚燒滿清的撫按衙門、吳王署等處官舍。滿清總兵土國寶很狡猾，帶兵埋伏在文廟裏向起義軍反攻，起義軍不及防備，終於失敗。土國寶爲了洩憤，整整屠了半個城。

蘇州起義的失敗，並不是偶然的。士大夫分子和勞動人民，雖然可以在反清的共同點上聯結起來，但這中間還是有隔閡的。例如楊廷樞就曾反對過民兵向富戶徵用糧餉的辦法，他寧願讓自己處在孤立狀態中，以致不久之後隻身被俘而死，也不願爲了抗清而有損於地主階級的利益。這只是其中的一例而已。

現在，顧炎武和歸莊、吳其沆、楊永言等，從蘇州回到崑山來。崑山處在長江岸邊、通路以北，比較偏僻，因此，清兵對它的佔領也稍微晚一點。閏六月初，蘇州的漢奸知府才派人來張貼「安民榜」，並取去全縣的錢糧冊子；過了幾天，又派來漢奸知縣閻茂才；又過了幾天，才頒佈薙髮令。這件事情，在崑山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樣，是引發暴動的導火綫。薙髮令一下來，就有不少人全髮自殺了，但有更多的人，則英勇地起來反抗。人們聚集起來，殺了漢奸知縣，焚燒了滿清的衙署，推舉出守城的指揮官，迎接楊永言回城主持縣政，封閉城門，準備拒抗清兵。保衛崑山的戰鬥，自閏六月十五日延續到七月初六日，堅持了二十一天。

之久。顧炎武和歸莊在義軍中管移檄傳令等事。但閉城拒守，究竟是使自己陷入劣勢地位的戰略，因而終於失敗了。城破之後，顧炎武、歸莊、楊永言，由於掩護得好，逃走了。只有二十六歲的青年吳其沆，在這一役中壯烈地殉國了。顧炎武曾有詩悼念他，還曾三次訪問他的故居，拜慰他的老母。

在兩度反清起義失敗之後，顧炎武開始過着流浪和亡命的生活。在這期間，他的家庭遭到了慘禍。崑山城破之後，清兵大肆屠殺。在顧家，清兵殺死了顧炎武的四弟顧纘和五弟顧子武，他們的生母何氏也被清兵砍斷了右臂。九天之後，常熟城也破了。顧炎武的嗣母王氏聽到消息後決心絕食殉國。她，在絕食十五天之後，清兵到語濂涇來的前天，逝世了。她在悲痛中給她的嗣子留下了遺囑：「勿爲異國臣子。」這些骨肉間的慘事，一件件有力地錘鍊着亡命中的顧炎武，使他的愛國思想較之國難初臨時更加鞏固和充沛，使他的愛國行動更加積極和堅定了。到這年年底，十二月十九日，他才得以偷偷回到語濂涇來。他避開清兵的巡邏，搬取他嗣母的靈柩，趁黑夜草草歸葬到崑山縣的祖塋裏去。

從此以後，顧炎武就很少回到崑山原籍來了。清朝的軍隊和偵探，在大漢奸洪承疇指揮下，一天比一天更加重地對江南人民進行鎮壓。當初起兵抗清的人物楊廷樞、陳子龍以及顧咸正等，都以暗結唐王或魯王的嫌疑，或以陰謀激發兵變的罪名，被捕殺了。每當聽到這

些消息，顧炎武就寄悲憤於悼詩；同時，他也由此提高了警惕，行蹤更加隱蔽了。在此後的十年之中，他在大江南北往返地繞行着，有時到東海上跟魯王或是隆武帝的人進行一些聯絡；有時在江南的金陵、鎮江、吳江、嘉興一帶，作短期的居留；有時乾脆改變儒生的衣冠，扮成商賈的模樣，到江北淮安的清江浦、王家營等地作一些活動。從此，他不僅僅利用舊日復社的關係，去結交更多的一些反清復明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並且大胆而又謹慎地去結交一些社會關係極其複雜的鹽商了。

在吳江，他結識了一個福建大鹽商的兒子王璣。這個王家，原籍安徽歙州，後來遷到福建的南平，世世做包賣食鹽的生意，在沿運河南北各大站口，都有很多的聯系。到王璣身上，才棄商讀書，他還在錢塘縣中過一名秀才。據說，此人有堅定的愛國思想，曾於明亡前後僕僕旅行於京、薊、膠、萊一帶，圖謀救亡之道。他還寫過一種書，叫做信書，內容如何，已無從知道。他對顧炎武的幫助很大，此後顧炎武沿運河南北往來，有許多關係都是王璣替他佈置聯絡的。

另一個鹽商是王略。他字起田，山陽人，住家在清江浦的附近。他家道十分富裕，但是有別於一般的富商大賈。據說他爲人正直，講信用，能够慷慨地周濟別人。顧炎武自從與他結交之後，便經常得到他的許多幫助。他替顧炎武在淮河和運河交流處的王家營地方經營了